

教育数智化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1.007

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的反思与应对



刘 珊^{1,2}, 王建华¹

(1.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2.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徐州 221116)

摘要:在数智技术深度渗透的现代社会中,学术职业日益呈现景观化特征。大学教师的学术实践不再限于传统的教学与研究,而是被嵌入可视化、可评估、可传播的技术治理逻辑。教学活动趋于平台化与表演化,科研成果被通约为可量化的绩效指标,教师身份异化为依附于媒介机制的视觉符号,大学组织运行逐渐形成以可见性为导向的绩效仪式。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的生成是制度驱动、技术催化、文化诱导、主体同化等多维力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累积效应正在不断侵蚀学术职业的专业性、教育性与公共性。为实现学术职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重构评价体系,重建学术本真秩序;优化媒介环境,强化学术表达伦理;重塑学术文化,坚守教师职业价值;激活主体行动,促进学术生态共生,从而推动大学回归学术本位。

关键词: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高等教育;媒介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1006612

一、问题提出

在全球知识与科技革命深度融合的时代,学术职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大学教师的使命担当和个人价值实现,更是高等教育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知识生产服务人类社会进步的长久期待。伴随数智时代的到来,数智技术深度融入知识生产与社会运行,高等教育的治理逻辑与文化结构正经历深刻重构。数智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在提升效率与便捷性的同时,也重构了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范式,并在制度、技术、文化与主体实践等交织作用下引发学术职业异化、学术意义式微与职业认同

修回日期:2025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才项目“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工作世界的具体问题研究”(22VRC010)

作者简介:刘珊,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王建华,男,河南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刘珊,王建华.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的反思与应对[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1):6677.

Citation format:LIU Shan, WANG Jianhu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spectacularization of academic profession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6, 14(1): 6677.

危机等结构性问题。

近年来,学界围绕学术职业面临的绩效压力、知识商品化与文化脱嵌等现象,提出多个批判性概念。在学术治理层面,“绩效大学”反映了现代大学对关键绩效指标的崇拜及其如何在绩效管理 & 量化评价驱使下演变为以绩效指标为核心的治理模式^[1]。“学术单位体治理”剖析了院系制的科层化治理特征及其导致的院系竞争“白热化”、学术利益“圈子化”、教师“双重忠诚”等问题^[2]。“学术发包制”^[3]与“学术动员”^[4]阐释了行政权力通过任务分解和项目制管理,将知识生产层层外包、层层动员的学术治理模式。“学术指标化”^[5]及“指标治理”^[6]揭示了绩效指标在学术评价与学科建设中的深度嵌入及其支配作用。在学术生产层面,“学术锦标赛”^[7-8]与“学术擂台赛”^[9]揭示了高校以科研产出为核心的横向竞争机制。伴随量化评估和“唯论文”现象的出现,“仿真学术”^[10]日益凸显,学术成果由真理探索的本真状态转化为可展示的符号产品,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劳动异化”^[11-12],使大学教师陷入自我剥削与符号化生产的循环。在学术文化层面,“学术表演”^[13]批判了学术研究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对学术创新本真价值的削弱,“学术符号”^[14]揭示了在等级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论文、项目和奖励作为学术一般等价物,成为教师身份、资源分配和学术地位的象征。此外,“学术悬浮化”指出学术活动逐渐脱离现实关怀而成为空转的符号游戏,带来学术与社会的割裂^[15]。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绩效化、表现化、指标化、符号化影响下学术职业的多维病理,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现有研究多集中对单一制度或表层现象的线性批判,缺乏对制度权力、媒介技术、文化表征与主体实践之间交互关系的整体性分析,尚未深刻揭示数智技术如何嵌入教学科研过程并与绩效治理、平台算法共同构成新的学术生产结构,难以回应教师在智能化、可视化与传播化环境中遭遇的结构性职业危机。

居伊·德波(Guy Debord)指出,现代社会已演变为“景观的积聚”^[16],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日益被图像关系取代,原本基于经验与实践的生活世界逐渐让位于由媒介主导的表征循环。景观不仅是外在的视觉呈现,更是一种由符号化和意象化构成的主导性社会逻辑,广泛渗透经济、文化乃至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17]。进入数智时代,景观逻辑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借助算法、技术和媒介工具得到制度化升级。数智技术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有机融合,数智时代是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统称^[18]。数智社会不仅改变了信息处理方式,更重塑了信息逻辑、交往结构和知识认知方式,构建起一套“可计算现实”的知识图景。在这种新的制度与媒介机制下,教学与科研被纳入可量化、可传播的绩效体系,学术劳动由“不可见的过程”转向“可展示的内容”,大学教师角色也在媒介反馈与自我呈现的交互中逐渐趋向图像化、标签化与人格算法化。数智技术不再只是外在的工具,而是深度参与学术职业建构,成为景观逻辑技术化嵌入的重要支点。所以,学术景观化并非表象的修辞,而是复杂因素交织作用下的教学、科研、学术职业身份和高校组织运行景观化的综合写照,其生成过程内含制度驱动、技术催化、文化诱导与主体同化等多重动力机制。

本文提出“学术景观化”概念,旨在揭示大学教师如何在绩效规训与技术渗透中被动构建以观看性与传播性为导向的职业身份,并由此拓展景观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解释效力,为理解教师在景观治理中的反身行动与抵抗实践提供理论框架。为此,本文围绕以下3个关键问题展开探讨:(1)数智社会如何重塑学术职业的存在方式与实践逻辑?(2)学术景观化的生成机制由哪些因素驱动?(3)如何应对学术职业景观异化,重建学术尊严与专业意义?

二、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的现实表征

在数智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大学教师的学术实践不仅发生于教室、实验室与学术共同体,还被嵌入一个强调可展示、可传播、可消费的技治环境。教师不仅要在制度体系中应对量化考核的压力,

还要在舆论场与平台空间不断输出形象内容、维系公众能见度。由此,一个多维度、跨媒介、高度可视化的学术景观悄然成形,它不仅重构了大学教师的教学、科研过程,也重塑了他们的职业认同与社会角色。

(一)教学活动景观化:从传道授业到表演输出

在传统教育语境中,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激发思维、涵养人格的深度对话过程。大学教师的职责在于系统讲授课程,引导学生建构认知、发展思维。然而,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与技术平台的深度介入,传统教学秩序正面临重构。智慧教室、MOOC、SPOC乃至直播课堂等将教学活动嵌入一个高度可视化、可量化、可监控的媒介场域,教师的授课在镜头下展开,随时被录制、上传。学生的学习行为也被学习通、雨课堂等工具实时追踪,构成一套以观看、反馈、排名为中心的教學数据集。教师教学过程中的内容编排、节奏控制、语言风格乃至表情管理、板书设计均面向平台逻辑进行适配优化。为获得观看性与传播力,大学教师被迫在视觉呈现上投入更多精力,“思想引领者”逐步转化为“内容生成者”,甚至是“教学表演者”。正如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言,在社会剧场中,个体在他人注视下不断上演前台行为,以赢得信任与社会认同^[19]。这种表演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高度策略化的自我展示。教学剧场中的教师亦不例外,他们必须掌控姿态、语速、语调、眼神、肢体语言等细节,以迎合观众(学生)和平台的需求。在景观逻辑下,教学不只是一项认知性的组织行为,更是一场经久不息的“视觉演出”。

如果教学成效依赖观看量、点赞与评分等平台指标来评估,那么教学的本质将异化为内容制造与视觉产品。随着算法将学生标签化为“用户”、将教学简化为“内容”,教学的意义也被异化为“被观看”和“被点赞”的数字偏好。一些高校的智慧教室和在线课程平台开始借助课堂实录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抬头率、专注率、互动率等进行量化分析,并将其作为教师教学表现的重要参考。教学竞赛的价值被量化认定,成为教师职称晋升和绩效评价的考核指标,甚至呈现“运动式”的宣传造势倾向^[20]。原本旨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高教学质量和推动教学创新的教学比赛,在数字化和媒介化的影响下演变为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在“重表轻里”下,学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选拔和培训“演员”以及包装参赛作品,参赛教师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重复演绎预设脚本,不仅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也干扰教师的正常教学秩序。教学质量的判断标准越来越偏向视觉吸引力与传播效率,而非对教育内核的真正关注。在此环境下,教师身份的建构也在发生转变。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需要在与外部环境的持续互动与反思性活动中得以建构和维系^[21],大学教师学术职业身份的建构不仅依赖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也越来越依赖外部反馈的持续刺激。若平台反馈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教学本体,“看点”或将压倒“学点”,教学的意义则难免被风格化与碎片化的景观表象遮蔽。一旦这种倾向被算法机制和绩效制度强化,其带来的教育理想式微与育人功能弱化,将对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构成挑战。

(二)科研活动景观化:从知识生产到数字呈现

科研应立足对真理的追问和对社会需求的回应,致力于拓展人类的知识疆域。在绩效导向日益强化的大学治理结构中,科研活动被嵌入一套以“可见性”为核心的数字评价机制。科研和发表成为大学质量评价的硬通货^[22],论文数量、期刊等级、被引频率等量化指标成为科研价值的主要判断依据。这些原本作为管理手段的技术性指标被赋予“终极判断”的权力,左右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路径。于是,一项研究的意义不再根据理论贡献或方法创新,而是依赖是否具备“可发表性”“可评估性”“可推广性”等外在特征。这种机制催生一种象征性绩效景观,即以成果的展示能力替代学术深度,使科研沦为一种结构性表演。研究选题、研究方法乃至时间安排等都围绕制度目标进行配置,学者不得不在“能否通过评审”和“是否有绩效加分”中做出妥协,科研伦理与知识志趣由此被边缘化。

部分教师在绩效压力下固守安全选题,以确保成果的快速产出与高频可见。这会侵蚀科研的本质,使“提出并解决问题”的理想让位于“制造成果”的功利。

在景观社会中,科研活动的评价越来越依赖其展示形态而非学术实质,“能否进入高被引榜单”“是否具备传播潜力”“能否可视化表达”等指标成为重要判断标准。科研内容被不断转译为平台友好的传播材料,如公众号推文、短视频解读或视觉化图谱等,甚至被要求打包为可供展示的成果资源包。虽然这种策略扩大了科研成果的公众触达率与平台曝光度,但也可能削弱学术的深度与研究伦理。当科研成果必须具备视觉吸引力、话题性与转发能力时,学术话语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平台算法与传播逻辑。此外,科研成果的本质被异化为可消费、可流通的视觉符号,学术失去其原本的探索属性,而数字景观的技术僭越则进一步放大这个趋势。与传统景观以图像复制为特征不同,数字景观呈现一种媒介深嵌、结构生成的特性^[23],图像不只是视觉呈现的结果,更成为算法控制、数据驱动与平台逻辑嵌入后的产物。当代技术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商品的“批量生产”或同样形象的“批量复制”^[24],而是数字控制与图像增值带来的新型再现机制。科研活动的表达正在经历由内容生产到形象运营的转型,原本服务于知识建构的学术期刊也不再是学术共同体分享研究、互相切磋的“思想工坊”,而更像是等级竞争下的“展示剧场”^[25]。在此情境下,科研的内在逻辑亟须重新审视,数字景观中的学术实践亦亟须重构其价值坐标。

(三) 职业身份景观化:从学术主体到视觉符号

在高度媒介化与数字化生态环境中,学术职业身份建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术场域,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智慧平台和虚拟社群实现符号再生产^[26]。尽管同行评议与学术规范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媒介曝光、网络热度、平台算法等因素也在不断介入,对大学教师学术形象的塑造产生深刻影响。大学教师不再只是学术共同体中专注研究、传道授业的专业成员,而被期待成为能够持续输出观点、具备传播能力的“知识表达者”。这种角色转变体现了对“被观看性”的主动适应,也契合商业领域的PIE(performance, image, exposure)法则,即职业成功不只依靠“做得好”,更取决于形象与曝光^[27]。在数字生活世界中,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可能最终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28]。个体对自我呈现的管理也趋于策略化,“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使他们做出他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19]5}。大学教师也以形象管理的方式参与学术劳动,将教学和研究行为转化为可传播、可打包、可符号化的视觉内容,以符合平台算法与观众期待。这是一种新的权力机制,即“景观监视”(synoptic veillance)。相较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监视”,“景观监视”的特征在于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注视^[29],即学者在社交媒体和教学平台上发布内容,随即面临来自学生、管理者乃至社会公众的集体观看与反馈。这种去中心化的监视方式使学者在看似自主表达中不断受到可视化秩序的规训。“以形式创新来吸引眼球的学术生产”“话语生产绝对过剩、却缺乏切实意义的学术研究”被批评为“学术表演”^[13]。高校内部存在“学术再生产过程中因学术异化而出现的、与本真学术相对的学术现象”,这些“仿真学术”的持续蔓延,对一流大学的发展与真正的学术创新构成深层危机^[10]。在“绩效愉悦”与“绩效恐惧”的影响下,教师逐渐形成一种表演型身份认同,其行为目的不再是纯粹的教育或研究,而是服务被评估、被展示的制度逻辑^[30]。这不仅揭示了教师如何在景观社会中逐步自我展示化,更深刻指出其专业身份正被持续的可见性生产重构。

在学术评价中展示性符号正取代内容本身成为衡量学术水平、评定学者地位的通用指标。“我们的社会使视觉癌变,依据事物展示或被展示的能力来衡量其真实性。”^[31]这一批评带有隐喻色彩,精准洞察当下社会判断标准的异化。在学术场域中,期刊等级、科研项目、人才计划等被指认为“一般等价物”,不仅与资源、待遇、晋升直接挂钩,更与学者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身份合法性紧密相关,

甚至决定着学者的地位、资格乃至学术生涯,真正的学术劳动却被符号化机制遮蔽^[14]。因此,大学教师不得不依赖等级符号重构自身的行动目标与生存方式。然而,将教育成果简单等同于可量化的数据,本质上是对教育专业性的冒犯,实践中却未引发学术共同体有效的抵抗,反而得到部分教育专家的助推^[32]。这种非反思性的顺从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符号统治下的学者主体性弱化不只是外部压力的结果,更是一种个体内化的选择。个体身份的稳定有赖自我意识与社会互动的双重建构,如今这种互动更多转向可见性、流量和符号交换。学者们在“内容生产者”与“舆论承载体”之间来回切换,职业实践逐渐被平台节奏与注意力经济主导的运行主导。在学术景观中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具有主体性与批判精神的“学术人”,而是沦为方向感丧失、价值感虚弱的景观社会生存者^[33]。

(四)组织运行景观化:从制度治理到绩效仪式

在绩效社会中,大学的组织治理正转向以“可见性绩效”为中心的治理范式。在学科评估、大学排名等驱动下,许多大学更加关注外部绩效的塑造,包括大学官网是否频繁更新、公众号是否有“十万+”推文、宣传片是否制作精美、师资榜单是否排名靠前等。这种追求可呈现性的组织运行逻辑构建一种以展示为导向的大学绩效文化。管理者不再仅仅关注教师“做了什么”,而更关注“做的事情是否可以传播”“是否能为学校带来可视化政绩”,因此组织治理由事务管理转变为景观建构。“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图像之间社会关系的中介”^{[16]4},这在大学组织运行中得到真实演绎。我们已经看到可视化数据如何成为连接大学形象与社会认同的桥梁,表征性政绩何以成为大学资源竞争的重要资本。

景观逻辑一旦嵌入组织运行体系,不可避免地反馈并塑造大学教师的日常工作实践。教学过程需全程录播、生成数字档案,教学成果不仅要在官网展示,还要在公众号推广;科研工作需形成便于传播的“成果展示包”,包括可视化图表、社会影响分析与受众数据;学术会议发言被压缩为可截图的片段;学生辅导需形成“成长故事”,供招生宣传或榜样示范所用。如此,教师不仅要完成实质性任务,还必须接受其展示价值的额外评估。倘若教师的每一个动作都被要求以可归档、可量化、可观察的形式呈现,其专业性不仅受到显性规训,更会在无形中被符号规训。教育之所以能够保持思想性与批判性,是因为它始终具备“反过来观看”社会与现实的能力,而非被动地接受凝视与展示^[32]。今天的大学经历着从“规训的表现”到“表现的再进化”,其组织本体功能正逐渐让位于图像化治理与传播性建设。若大学长期倾向奖赏可报告性成果,极易诱导教师形成仪式性参与和策略性顺从的职业习惯。大学组织文化也可能从重学术的知识场走向重绩效的表演场,教师从学术共同体成员沦为绩效系统中的数据生成者与视觉材料供给者。与戏剧表演、机械性能和心理行为的可观察、易测量不同,组织绩效本质上是不可观察、难以测量的^[34]。如果大学持续将教育与科研活动纳入片面追求可展示性的治理框架,制度要求与学术使命之间势必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三、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的生成机制

在教学、科研、职业身份与组织治理中,大学教师卷入以可见性为核心的景观评价。为何“被看见”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常态,甚至内化于学术实践逻辑中?“任何能看见的东西也想被看见,任何能听到的东西也想被听到,任何能触摸的东西也想被触摸。”^[35]在景观社会中,个体与组织对显示度的渴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展示”不再只是制度规训,更是价值确认与身份建构的重要方式。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的生成并非单向度的压力结果,而是制度驱动、技术催化、文化诱导与主体同化等多维力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呈现由生成条件到演化过程再到反馈强化的复杂链条(如图1)。

(一)制度驱动:绩效考核的数字崇拜

在数智时代,数字凭借其强大的宰制性力量成为一种社会的集体信仰^[36]。绩效制度对可量化指

标的非理性崇拜驱动了学术职业景观化的生成。在当下生活中,不论是公领域还是私领域,都设定了能用数字量化的成果参数和状态参数,并以此将成果和状态可视化,接着使之可比较,最后可操控、可优化^[37]。学术领域也不例外,无论是职称晋升、人才引进、科研奖励,还是年度考核与经费分配,都越来越依赖一套以可量化数据为核心的绩效标准。这些指标初衷在于提升管理的客观性与效率,在实践中却异化为强调“可见绩效”的制度逻辑,重塑教师的学术与职业取向。“整个量化评价制度是考虑不周的错误构想,其动力是美国学术生活的市场精神。”^[38]在这种市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制中,出版物成为衡量学术市场价值的关键凭证。教学活动更加关注智能统计与评分反馈的数字指标,科研活动也趋向成果生产的流水线式操作,研究选题、发表渠道乃至学术表达都围绕“能否进入指标体系”展开。随着绩效测评体系嵌入大学治理结构,学术活动日益受到外部评价标准的制约,原本强调自治与多元的制度形态逐步被指标驱动的治理方式取代。大学通过复制政府评估体系,将外部标准内嵌于内部运作以争取资源并回应监管要求,体现了一种“适应性同构”(adaptive isomorphism)的组织策略^[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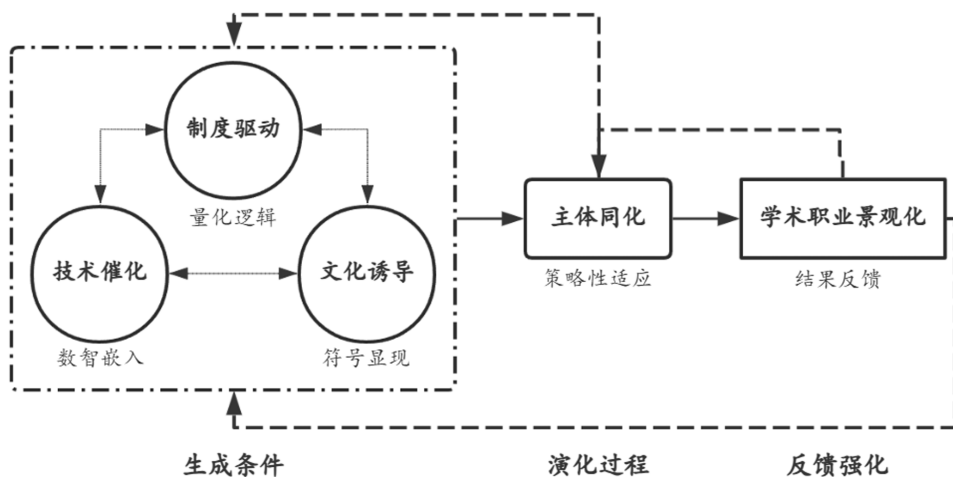


图1 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的生成机制

随着唯绩效论或绩效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渗透,曾经为测量和提高绩效而发明或建构的理论、技术和制度反倒成为大学改革中亟待反思的问题^[1]。将大学局限于量化语言是对其宗旨的束缚,社会文化机构绝不能用数字来衡量^[40]。量化逻辑在本质上是象征资本再分配的技术工具,高等级期刊发表、国家级项目立项、学术排行榜登榜等象征资本的获取,成为学者身份合法性的关键凭证。在这种制度认同下,教师的研究过程被拆解为可操作的发表任务,教学被简化为评分导向的流程,形成以制度可见度为核心的绩效景观。这种景观不仅重构高校内部的学术评价秩序,也在无形中强化学术行为的功利化和工具化倾向。这种绩效主义的评价框架在强调量化标准的同时,忽视了教育与科研的过程价值与精神内核。研究选题的原创性、教学内容的思想深度、学生成长的不可预期性难以在可测量的指标中得到真实反映。教师的专业判断力和自由空间被压缩,甚至产生价值迷失。“研究人员调整了自己的定位,从事与‘研究’相去甚远的‘文章生产’。教师和研究人員应当承担的多维度的工作任务不见了,比如陪伴自己的学生接受教育长大成人,以及树立自省精神,形成批判意识。”^[41]这不仅反映出量化逻辑对学术实践的深度干预,也暴露了在数字治理背景下高等教育学术本体功能的日渐式微。

(二)技术催化:媒介机制的深度嵌入

数智技术通过平台算法和媒介机制推动学术职业景观化的结构演化。媒介技术的深度嵌入重构

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表达方式,使学术实践愈发走向以视觉化、平台化和内容逻辑为主导的方向。随着智慧教室、智能教学平台、人机交互系统等技术的普及,教师授课的过程以及学生的学习行为都在平台上被全程记录、计算、评估与反馈。科研成果的传播路径亦发生根本转变,由传统纸媒期刊扩展至高校官网、微信公众号、视频平台及学术社交媒体。这些看似提高效率的手段已逐步将教育与科研实践纳入以平台逻辑与图像机制为主导的深层结构。在信息高度媒介化的时代,图像不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构成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真实”(hyperreal)机制^[42]。课程视频、学术推介、成果展示都不再只是教学和科研的附属外壳,而成为学术活动的替代物。大学教师被动卷入这种机制后,不再以知识内容为核心,而是力求在内容的可见上谋求价值的实现。

媒介平台并非中立工具,而是深度介入知识生产与学术职业的力量。平台通过算法推送、视觉反馈、热度排名、弹幕互动等机制塑造一种以观看量、点赞数、传播效率等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在教学层面,教师根据学生注意力规律和平台推荐规则设计“轻量化”“易吸收”的课程内容;在科研层面,标题的吸睛性、摘要的可传播性和成果的可转化性等成为影响其绩效表现的关键维度。这不仅改变大学教师的表达风格,也在不断重塑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平台逻辑正重塑信息表达方式的结构规则,使内容生产日益围绕算法推荐与用户偏好展开,弱化了原本应有的表达深度与专业性^[43]。在教学与科研逐渐平台化的背景下,学者的知识表达也受到类似的机制驱动,其专业性内容不断被压缩为可传播的信息单元,学术深度不断被传播表现僭越甚至替代。媒介环境表面上是开放的、去中心的,实则受制于平台算法和硬件设施的“在地化与物质性结构”^[44]。在此环境中,大学教师作为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在教学视频、科研发布与学术展示等实践中需要适应平台对内容风格、表达形式和传播路径的调度。媒介技术在表层的便利与效率背后构建一种隐性的“观看规训”机制,使大学教师不得不以可传播、可消费、可景观为导向重构学术行为。由此,数智技术最终走向人的对立面,并以景观的形式对学者进行支配,人沦为技术的附庸^[45]。

(三)文化诱导:可见性秩序的认同重构

景观社会文化通过可见性影响大学教师的学术行动与身份认同。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被看见”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有价值”,成为衡量职业影响力和社会存在感的重要标尺。大学教师的职业形象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可见性优先的逻辑。传统上,学者的职业权威建立在其学术积累、研究深度与教学经验之上,依靠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评价机制实现认同与声望的建构。随着媒介与数智技术的全面渗透,学者的职业身份经历由“知识工作者”到“内容输出者”、从“研究型专家”到“公众表达者”、从“学术权威”到“教育KOL”(key opinion leader)或“知识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转变。大学教师开始倾向借助媒体平台和社交网络拓展其学术传播与公众参与渠道。短视频课程、新闻点评、直播授课、图文内容等成为部分学者参与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以及建构职业形象和拓展学术影响力的新维度。在教育、传媒、经济、法律等领域,一些高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还试图通过塑造“明星教师”形象来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以便服务于人才引进和招生宣传。这些做法虽未在正式考核体系中普及,但作为教学改进和教师评价的参考数据,正在潜移默化地推动教师对可见性秩序的认同。

研究发现,教师在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碎片化的呈现”与“日常化的表演”重塑自身的专业身份,其媒介行为已成为职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46]。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学者需要不断在公众空间进行自我表达与自我呈现,通过语言风格、图像形象、标签分类、平台话语等符号系统对自身进行持续建构。这种身份的持续确认依赖外部可见性与即时反馈,粉丝数量、评论互动、引用次数、平台关注度等成为教师感知职业价值的“新型仪表盘”。原本作为知识传播手段的教育行为逐渐转化为风格化的“文化表演”,原本应聚焦深度思辨的科研工作也在影响力与关注度之间被符号化。在这

种文化结构下,大学教师正在遭遇由“真实身份”到“拟像角色”的转变,其职业认同也由依赖知识本体转向依赖符号系统与媒介机制进行维系,这不仅造成学者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折射出知识劳动在社会文化机制中的深层变异。

(四)主体同化:大学教师的反应性行为策略

面对绩效评价的量化转向、媒介技术的深度嵌入以及社会文化认同机制的深刻变革,大部分教师表现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应性行为^[47],他们通过改变自身的教学风格、研究方向与行为方式主动适应被“观看”的景观测量。在教学上,他们注重制作风格明快、配图丰富的课程内容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和获得较好的评价;在科研上,他们选择政策或热点话题以及更易被检索和传播的学术期刊或平台。部分大学教师的身份已呈现知识生产者、内容运营者及公共表达者等多重角色的叠加特征。采取反应性行为的教师虽在短期内可以获得绩效认同与可见性资本,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也隐藏着职业异化与认同危机等风险。若个体在场域中为获取资本而不断调整行为模式,最终可能在遵循规则的过程中被规则同化。在景观化主导的场域,大学教师在适应制度规范与媒介逻辑的过程中,也在逐渐将展示性理性内化为行为准则,将本应基于学术判断的实践转化为对被看见、被转发、被统计的回应。虽然教学和科研依然是大学教师最核心的使命,也是教师聘任与晋升考核的关键指标,但其本质已经被景观异化。大学教师开始重视个人品牌的打造与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塑造“表演性形象”(fabrications)以满足外部审查者的标准^[48]。尽管这种表演性响应可以在绩效体系中获得正面反馈,但也会侵蚀教师对学术使命的真实认同。大学教师可能产生认同断裂,包括学术志趣被绩效遮蔽、教育信念被流量裹挟、专业伦理被平台节奏吞噬等。一些教师还可能出现输出焦虑和形象倦怠,不再从其教学和学术工作中获得满足感,甚至主要依赖外部可见性来维系职业自信。这种适应性角色扮演的日常化不仅重构大学教师的职业惯习与身份结构,也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劳动的符号化趋势。

四、数智时代学术职业景观化的应对

在数智时代,虽然学术职业景观化呈现制度化、结构性蔓延的发展趋势,但并非不可逆转。在表演化、符号化日益常态化的学术生态中,大学何以坚守以知识探究和人格培养为核心的精神根基?教师如何在绩效洪流与技术规训中找回教育的初心与学术的尊严?回应这些问题,既要从制度层面打破绩效崇拜和技术迷信,又要在文化层面重建学术的公共价值与职业伦理,更要在个体层面重塑学者的主体意识与行动勇气。

(一)重构评价体系,重建学术本真秩序

重构评价体系旨在破解量化至上对学术本真的反噬,祛除学者对指标数据的过度崇拜迷思,从而重建学术生活的本真秩序。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机制之一就是以成果可视化为中心的绩效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试图以量化指标替代主观判断,实现学术劳动的标准化生产与精准治理。论文数量、期刊分区、项目等级、影响因子等构成知识生产的“通用货币”,在组织运行中形成可以加总、比较、兑换的评价系统。这种高度可管理化的制度逻辑虽然提升了大学治理的效率,却也在无形中将可计量性误置为学术质量,用易呈现性替代知识原创性。由此,大学教师被规训为“结果交付者”,其专业判断力与研究热情被转化为一种符合指标模板的生产任务。学术不再是一种天职或内在的召唤,而变成一场“被看见的工程”,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指向在报表中成为可排序的绩效体。

科学的重要特征是“某些最为重要的推进是意料之外的,并且在一开始就难以嵌入某一研究项目”^[49]。真正的学术精神绝非源于数字统计,而是在问题意识、深度思考、长期积累与专业判断中不断孕育和生长。重新回到学术本位意味着必须破除现有评价体系中可视绩效的中心地位,推进对“有质量而非有流量”的认知重构。这样的认知重构要求大学从制度上承认大学教师职业的多元性

与非均质性,研究型、教学型、实践型等不同类型的大学教师不应被统一的绩效模板裁剪,而应获得差异化支持与多元性评价;构建更加注重过程与内容的学术评价机制,多鼓励“慢”研究、基础研究、跨学科研究等长期项目;将教学工作作为重要考察内容重新纳入大学教师职业价值体系,建立教学观察、学生深度访谈、小规模研讨课程考核等定性评价机制以恢复教学的创造性。这些改革的重点不是对量化的否定,而是将数字的压制性机制转化为辅助性工具。只有评价体系真正让位于教育的内在逻辑以使不可量化的部分获得生长空间,大学教师才能从结果的生产者回归为思想的耕耘者,学术才可能从景观展示重返其原初的思辨世界。

(二) 优化媒介环境,强化学术表达伦理

优化媒介环境,防止平台算法对学术表达的过度干预,引导学术传播回归本真,塑造一个兼具公共性与教育责任伦理的“去景观化”学术表达空间。在平台算法主导的话语环境中,媒介传播的速度、受众的反应、内容的流量转化被置于知识本身的复杂性、深度和真理价值之中。知识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是否经得起批判、能否引发深思,而被简化为“能否抓人眼球”。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此得到新发展,深度被表象替代、复杂被娱乐包装、学术被景观化为“内容”,而平台算法与传播逻辑则成为新的隐性生产力。媒介化并非对抗学术的力量,也可能成为重建公共知识空间的契机。首先,大学及教育机构应承担公共平台建设的责任,不是将大学教师的表达完全外包给商业媒体或算法驱动的社交平台,而是构建去中心化、低算法干预的学术传播空间。这种弱推荐机制的公共平台应鼓励深阅读、慢对话与跨界连结,而非追求观看总量与用户停留时间。可以试点运营以讨论学术争议、展示教学失败、开放研究过程为核心的学术社区平台,让知识传播回到协同探索而非内容输出的状态。其次,需要制度性激励深度表达。可以在评价体系中设立公共学术贡献维度,认可非主流平台的原创表达、教育播客、慢访谈、批判性科普等形式,并将这些具备公共价值的媒介行为纳入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考量。再次,在教学中融入媒介素养与知识表达伦理的课程培训,以帮助大学教师意识到在短视频、直播、公众号等媒介中,学术表达不仅是展示,更是一种对真理的负责任“转译”。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表述既关乎知识的传播方式,也关乎其在公共空间能否承担塑造理解与建立认同的责任。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学术表达与行动亟须回归显现的伦理维度,避免陷入指标陷阱。

当然,优化媒介生态并非拒绝传播,而是要重新定义何为有效的表达与可持续的观看。这不仅意味着大学教师要具备与媒介协作的意识,也意味着平台与制度应尊重学术的复杂性,允许学术表达变得更慢、更沉静、更不被打断。未来的知识社会需要的不仅是流量型学者,更需要深度表达者。真正值得期待的媒介生态,应能承载复杂思想、鼓励差异对话,而非仅仅作为放大已有共识、强迫统一叙事的算法回音室。唯有如此,大学才能恢复其公共空间的角色,大学教师才能在表达中重拾内在尊严,学术也才能从“被观看的表演”转回“被理解的思想”。

(三) 重塑学术文化,坚守教师职业价值

重塑学术文化旨在唤醒教师职业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内核,使其即使处于日趋景观化的学术生活,也依然愿意坚持以学术为志业,乐于坚守知识探索的自主性与价值性。如果说制度评价和媒介技术构成学术景观化的外部推力,那么学术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大学教师个体的认同逻辑则构成其内部温床。在当前高等教育生态中,学术文化正由“求真—批判—合作”的知识传统转向“绩效—展示—竞争”的符号表达。在此过程中,大学教师的职业身份也在变异,他们不再是以真理为志业、以教学为责任的知识耕耘者,而是逐渐异化为以标签、头衔、排名构成存在感的学术演员。学术不再是一种集体性、反思性实践,而成为零和博弈的竞技场,成果、曝光度、被引频次成为身份构建的主要资源。学者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看起来学术”的流量密码,习惯于在可展示的舞台上争取组织和舆论的认同,其日常行为越来越倾向为某种绩效形象的维护服务。

这种愈演愈烈的象征竞争在一点点地侵蚀学术的文化基础,教学被降格为“传播任务”,研究被异化为“文献消费”,学术讨论变成“关系管理”,评价制度、平台机制与文化逻辑相互交织形成一种精致的职业表演系统。大学教师在其中不断调适以求适应的同时,也面临着深层的价值分裂与职业疏离感。重塑学术文化不应只是一种伦理劝说,而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重建工程。大学需要在组织层面重新设定“值得追求的学术生活”愿景:一方面,倡导以学术为志业的职业伦理,鼓励大学教师将时间投入长期性研究、失败性尝试与教学改进;另一方面,重构学术共同体意识,推动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学术交流机制,恢复同行批评、学术争议与观点多元化的空间,使大学教师重新在彼此倾听与共同成长中获得认同。此外,大学需要构建以反景观化为导向的学术职业发展路径,让不以绩效为中心的学术行为获得制度承认和文化尊重。这种文化机制可以帮助大学教师在表演性逻辑之外重新发现学术的意义,为大学重建有温度、有诚意的学术文化创造条件。学术既作为理念,也作为学者的日常工作^[50],但无论学术作为什么,都不应该作为一种表演而存在。

(四) 激活主体行动,促进学术生态共生

激活主体行动旨在打破“景观”对学术生活的僭越甚至操控,推动教师群体共建互助的学术交往生态,实现学者的合作共赢与共同成长。教师的实践智慧应该是“在技术牵引中成己、在教育嵌入中成物、在价值超越中成人”的动态过程^[51],这不仅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能力,也为抵御学术景观化提供了伦理支点。大学教师需要重新回到教学与研究的本体层面,将教学还原为一种基于知识、共情与理解的深度交往,将研究恢复为问题驱动的智慧探究而非指标驱动下的成果生产。大学教师可以主动构建“非展示性空间”以守护学术生活的内在维度,如深度写作计划、教学共读小组、长期性研究协作、学术日记等,虽难以转化为量化成果,却是职业意义得以沉淀与生长的重要土壤。“教育不是工业,而是农业,学校应给每个生命个体提供发现并发展自我的平台。”^[52]

面对大学教师普遍遭遇“高绩效—低资源”的双重压力,以及被数据、算法与媒介技术规训的现实困境,构建“具有韧性的职业生态系统”(resilient academic ecosystems)成为关键破解路径^[53]。一是设立“低绩效窗口期”,让教师周期性摆脱成果压力,专注于深度研究与教学积累;二是提供“反景观型假期”,使教师能够远离平台侵扰,重新与真实世界和学术精神对话;三是建立教学发展共同体,以教师互评、跨学科教学坊等形式激发教学合作与反思;四是营造协同发展的学术生态,打破个体单打独斗的局限,通过跨院系、跨代际、跨领域的交流机制构建富有信任与支持的学术网络。学者的专业成长不是一个人在绩效洪流中的孤独漂流,而是一群人在信仰、责任与智慧中彼此支持、共建意义的行动冒险。当制度尚未彻底转向、文化仍在旧范式中徘徊不前、媒介扰动还在持续蔓延时,大学教师作为行动者的反思与抵抗是撬动高度教育结构性变革的关键杠杆。“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54]在这个被展示的偏好笼罩的时代,唯有当学者重新成为学术行动者、知识意义的阐释者与公共理性的守望者时,大学才能真正找回其应有的精神原点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 [1] 王建华. 绩效大学的生成与变革之道[J]. 教育研究, 2023, 44(10): 8897.
- [2] 张应强, 周钦. 从学术单位体治理走向学术共同体治理: 我国大学学术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J]. 高等教育研究, 2022, 43(2): 3141.
- [3] 解德渤, 于孟仟. 学术发包制: 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治理模式[J]. 重庆高教研究, 2022, 10(2): 816.
- [4] 解德渤, 张阳婕. 学术动员: 理解中国大学学术治理的新视角[J]. 重庆高教研究, 2024, 12(2): 4858.
- [5] 陈斌. 从“表现主义”到“本质主义”: 大学学术评价指标化的支配及其超越[J]. 高等教育研究, 2021, 42(5): 4454.
- [6] 苏永建, 盛嘉芯. 学科建设中的指标治理: 总体图景、生成逻辑与变革路径[J]. 高等教育研究, 2024, 45(10): 3749.
- [7] 阎光才. 学术等级系统与锦标赛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2, 10(3): 823, 187.
- [8] 陈先哲. 学术锦标赛制: 中国学术增长的动力机制与激励逻辑[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 38(9): 3036.

- [9] 韩双森,谢静.学术擂台赛:学术职业研究的整合性概念体系与案例阐释[J].中国高教研究,2024(1):7478.
- [10] 董云川,李保玉.仿真学术:一流大学内涵式发展的陷阱[J].江苏高教,2018(8):48.
- [11] 刘姗.走出“竞速游戏”:加速时代大学教师劳动异化的危机与应对[J].江苏高教,2024(7):2329.
- [12] 李印,布丹丹.高校教师劳动异化与职业倦怠归因分析[J].江苏高教,2023(6):7985.
- [13] 王晓升.论学术表演[J].江海学刊,2016(2):1522.
- [14] 熊进.符号视域下大学学术评价之批判与变革[J].高教探索,2020(1):1723.
- [15] 成伯清.学术的悬浮化及其克服[J].探索与争鸣,2019(4):1413.
- [16]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7] 石德生.景观社会理论:经济社会景观化构序构境的深刻批判[J].青海社会科学,2017(1):123128.
- [18] 王竹立,吴彦茹,王云.数智时代的育人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J].电化教育研究,2024,45(2):1319.
- [19]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0] 高若瑜.高校教师教学竞赛虚假繁荣的逻辑根源与治理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2,16(5):6472.
- [21]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9.
- [22] 刘振天.学科化与等级化:高校教学学术缘何陷入困境? [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45(5):3945,77.
- [23] 刘涛.超越“象征之殇”:物质逻辑与图像阐释的媒介视角——通往以媒介为方法的图像阐释学[J].探索与争鸣,2022(12):5773,211,215.
- [24] W·J·T.米歇尔.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M].陈永国,高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50.
- [25] 项飙.为承认而挣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13120.
- [26] 刘之远,王鹏.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学术社会化:特征、困境与纾解[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2):5959.
- [27] 赫布·柴尔德里斯.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M].杨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05.
- [28] 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M].李大白,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240.
- [29] 狄波拉·勒普顿.数字社会学[M].王明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4243.
- [30] HOLLOWAY J, BRASS J. Making accountable teachers: the terrors and pleasures of performativity[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2017,33(3):364382.
- [31]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41.
- [32] 高德胜.表现的学校与教育的危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7(6):1626.
- [33] 王济民,班建武.景观社会中人的境况与教育超越[J].中国电化教育,2023(7):2934.
- [34] 马歇尔·W.迈耶.绩效测量反思:超越平衡计分卡[M].姜文波,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前言V.
- [35] 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M].姜志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1.
- [36] 焦晨东,黄巨臣.从数字崇拜到数字正义: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研究新范式[J].电化教育研究,2025,46(4):19-25.
- [37] 安德雷亚斯·克莱维茨,哈特穆特·罗萨.晚期现代社会的危机:社会理论能做什么? [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155.
- [38] 斯蒂芬·科利尼.大学,有什么用:剑桥教授为大学教育一辩[M].张德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189.
- [39] GUARINI E, MAGLI F, FRANCESCONI A. Academic logics in changing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s: an exploration in a university setting[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counting & management,2020,17(1):109142.
- [40] 詹姆斯·H.米特尔曼.遥不可及的梦想: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M].马春梅,王琪,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9495.
- [41] 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M].周晓飞,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89.
- [42] 史蒂文·塞德曼.置身时代的社会理论[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284.
- [43] 孙萍,廖文钰,陈欣欣.关于平台、劳动与媒介研究的历史回溯与理论思考[J].全球传媒学刊,2023,10(5):423.
- [44] 孔舒越.在地化、关系性和物质性:新移动范式与数字时代的传播研究[J].全球传媒学刊,2023,10(5):3955.
- [45] 李子腾,王澍.数智时代教育的景观化风险与应对[J].学术探索,2025(5):154156.
- [46] HARTUNG C, ANN HENDRY N A, ALBURY K, et al. Teachers of TikTok: glimpses and gestur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J].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2023,186(1):8496.
- [47] 玛丽亚·优德科维奇,菲利普·阿特巴赫,劳拉·E.朗布利.全球大学排名游戏:变革中的高等教育政策、实践与学术生活[M].苗耘,马春梅,王琪,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4647.

- [48] BALL S. Performativities and fabrications in the education economy: towards the performative society[M]//GLEESON D, HUSBANDS C. The performing school: manag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 performanc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2004:210226.
- [49] 约瑟夫·本-戴维. 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M]. 沈文钦,陈洪捷,秦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207.
- [50] 安德鲁·阿伯特.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M]. 王桐,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165.
- [51] 叶波,吴定初. 智能时代的教师实践智慧:走向智慧的实践[J]. 教育研究,2020,41(12):129140.
- [52] 张玮凌,傅敏. 数智时代教师的角色危机及行动转向[J]. 电化教育研究,2025,46(4):7985.
- [53] RENKEMA M, TURSUNBAYEVA A. The future of work of academic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te-of-the-art and a research roadmap[J]. Futures,2024,163:103453.
- [54]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39.

(责任编辑:杨慷慨 张海生 校对:张海生)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Spectacularization of Academic Profession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LIU Shan^{1,2}, WANG Jianhua¹

-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 society deeply penetrated by intelligent digital technologies, academic professions increasingly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of spectacularization. The academic practices of university faculty a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but are instead embedded within a governance logic characterized by visibility, evaluability, and communicability. Teaching activities tend to be platform-oriented and performative; research outcomes are reduced to quantifiabl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eacher identities are alienated into visual symbols attached to media mechanisms; and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are increasingly driven by visibility-oriented performance rituals. The spectacularization of academic profession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erges from the dynamic interplay of multiple forc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impetus, technological catalysts, sociocultural inducement, and individual assimilation. Its cumulative effect is gradually eroding the professionalism, educational integrity, and public mission of academic work.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t is imperative to re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restore the authentic order of academic work; optimize the media environment and uphold the ethics of academic expression; reshape academic culture and affirm the professional valu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activate individual agency to cultivate a symbiotic academic ecosystem. These efforts are essential for guiding universities back to their academic foundations.

Key words: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cademic profession; spectacular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media technology